

官员任期与地方国企捐赠： 官员会追求“慈善”吗？

曹春方，傅 超

（西南财经大学 会计学院，四川 成都 611130）

摘 要：文章以2003—2011年A股市场上的地方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了官员任期对地方国企捐赠的影响，并探讨了这一影响在不同的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环境下的差异。研究发现：（1）官员因任期考核会追求社会慈善类的“形象工程”，具体表现为地方国企捐赠随着官员任期的增加呈现先增后减的趋势；（2）正式制度越完善（以市场化程度、中介组织发育和法制环境来度量）、非正式制度越发达（以宗教氛围来度量），官员任期对地方国企捐赠的影响越弱；（3）官员任期对地方国企捐赠的影响在“和谐社会”提出前后存在显著差异，也因GDP政绩、官员来源和企业政治层级的不同而有所区别。文章从官员任期角度探讨了地方国企的慈善捐赠行为，并拓展和丰富了官员“晋升锦标赛”和政府“掠夺之手”的相关研究。

关键词：官员任期；企业捐赠；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

中图分类号：F27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9952(2015)04-0122-12

一、引 言

政府行为对中国经济具有很强的解释力，自“晋升锦标赛”理论提出以来，政府之间的GDP竞赛几乎成为共识。^①但陶然等（2010）指出，官员的晋升未必仅是对短期乃至中期经济增长政绩的考核，而完全可能是社会发展、城市建设以及生态保护等方面的综合业绩考核。中央政府对官员考核的文件中也明确规定了多维度的考核标准，尤其是2005年以来，“和谐社会”在政府考核文件中多次出现，多维度指标越来越被官方重视和强调，现有文献也日渐意识到这一现实问题的重要性（钱先航等，2011；Zheng等，2014）。企业的慈善行为被定义为“企业以自愿非互惠的方式无条件地提供资金或者物资给政府或者相关机构”（Financial Accounting Standards, 1993），它体现了“和谐社会”中的“诚信友爱”特征。^②但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和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2006）的调查表明，中国

收稿日期：2014-09-23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71302181）；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13XJC630001）；西南财经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JBK1407133）

作者简介：曹春方（1985—），男，安徽安庆人，西南财经大学会计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

傅 超（1988—），女，浙江金华人，西南财经大学会计学院博士研究生。

①参见财经网：“地方政府或上演GDP锦标赛——专家称投资动机非常明显”，<http://economy.caijing.com.cn/2012-09-17/112132110.html>；人民网：“官员晋升锦标赛与竞争冲动”，<http://theory.people.com.cn/GB/41038/11649284.html>。

②参见人民网：“和谐社会量化考评体系已现雏形”。报道中提及在胡锦涛总书记对和谐社会6个基本特征的论述中，“诚信友爱”特征部分以“慈善捐款占GDP比重”来度量，<http://theory.people.com.cn/GB/49154/49156/4366695.html>。

慈善市场存在大量“公益摊派”现象，尤其是来自政府的摊派（杨团和葛道顺，2009）。^①而政府本身是一个抽象的“黑箱”，其特征其实是官员动机的体现（钱先航等，2011；曹春方，2013）。这种非市场化的捐赠必然体现了官员行为，但现有文献鲜有涉及。因此，本文将探讨官员行为对企业捐赠的影响。

地方政府往往会利用权力追求其政治目标，存在掠夺之手（Shleifer，1998）。具体到慈善捐赠上，由于在改善社会福利方面存在义务，政府对公司的慈善摊派和“逼捐”现象时有发生（周雪光，2005；高初建，2007；郭剑花，2012；张建君，2013）。大量文献从民企政治联系、政治参与和政治身份等角度发现政企联系会促进公司慈善捐赠（贾明和张喆，2010；梁建等，2010；高勇强等，2011）。为了政治晋升，国企高管也会主动以慈善捐赠来迎合政府的形象工程建设（郑志刚等，2012）。这些文献虽然丰富，但“只见政府不见官员”。官员任期作为我国官员治理中最制度化也最具普适性的模式，是影响官员执政行为及努力程度的重要因素（曹春方等，2014），^②能够较好地捕捉到官员的晋升动机。许多文献从GDP考核的“晋升锦标赛”角度研究发现，经济增长和地方国企过度投资会随着官员任期呈现倒U形变化趋势（张军和高远，2007；王贤彬和徐现祥，2008；曹春方等，2014）。本文延续这些文献的逻辑，以官员任期作为官员动机的代理变量，研究了它对地方国企捐赠的影响。

与本文思路类似的是戴亦一等（2014），他们研究了官员更替对企业捐赠的影响，发现企业在官员更替时会扩大捐赠支出，而且这一特征主要体现在民企中。然而，与官员更替相比，更多的时候官员是在任的。更为重要的是，官员更替是已知的，它并不能合理度量官员为晋升所做出的努力，而官员的这种努力会更好体现在晋升未知的任期中，尤其是5年一届的考核周期中。此外，与民企相比，国企行为更容易体现官员的动机（唐雪松等，2010；曹春方，2013；曹春方等，2014）。因此，本文研究官员任期对地方国企捐赠的影响能够扩展我们对和谐社会建设中官员行为的认识。

另外，大量文献发现完善正式制度环境能够抑制政府对企业的捐赠的正向影响（Detomasi，2008；贾明和张喆，2010；唐跃军等，2014），而戴亦一等（2014）却发现正式制度环境促进了官员更替之后企业的捐赠表现。这使我们不能完全明晰正式制度环境能否在国企捐赠上有效约束官员行为。North（1990）、Greif（1994）等强调，在正式制度尚不健全的转轨经济国家，非正式制度的影响可能更为重要。要理解中国的种种社会和经济问题，不能忽略在长达数千年的历史中缓慢形成而影响深远的非正式制度（Allen等，2005；陈冬华等，2013）。其中，宗教作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非正式制度中扮演了重要角色（Williamson，2000），而且宗教作为一种文化信仰，与社会、经济、政治之间的互动关系长期备受关注（韦伯，1958）。Du等（2014）的研究表明，中国的宗教传统能够较好地促进公司捐赠，上市公司的捐赠规模会显著增加。因此，我们有必要进一步考察不同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下官员任期对企业捐赠的影响。

^①陕西省神木县出现“有指标的捐赠额度”现象，2010年该县县委县政府计划建立促进可持续发展的3项基金，并提出了筹资30亿元人民币的目标，为此县里每一个企业都被分配了相应的“捐款”额度，<http://news.sohu.com/20110504/n306771987.shtml?qq-pf-to=pcqq.c2c>。

^②1982年的《关于建立老干部退休制度的决定》和1990年的《中共中央关于实行党和国家机关领导干部交流制度的决定》为中央对官员在某一职位上的任期控制奠定了基础。2006年的《党政领导干部职务任期暂行规定》等三个法规文件进一步明确规定，党政领导任期为5年一届，在同一职位上连续任职达到两个任期，不再推荐、提名或者任命担任同一职务，党政领导干部任期内和任期届满应当按照有关规定进行考核，这进一步规范了官员任期和考核。

综上分析,本文以2003—2011年A股市场上的地方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了官员任期对地方国企捐赠行为的影响,并讨论了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调节作用。本文的贡献主要体现在:(1)现有文献主要在以GDP为核心的“晋升锦标赛”框架下研究官员任期对经济增长和企业过度投资的影响(张军和高远,2007;王贤彬和徐现祥,2008;曹春方等,2014),本文则研究了官员任期对地方国企捐赠的影响,提供了除GDP之外,官员还会为晋升而追求社会慈善的证据,拓展和丰富了官员“晋升锦标赛”的相关研究。(2)关于政府行为影响企业捐赠的现有研究主要从企业政治联系这种“政企纽带”出发(高初建,2007;贾明和张喆,2010;张建君,2013),部分文献将视角拓展到了官员更替(戴亦一等,2014)。本文则从官员任期角度将“政企纽带”拓展到“官企纽带”,探讨了官员随任期变动的动机差异对企业捐赠的影响,从而拓展和丰富了政府“掠夺之手”的相关研究。(3)现有研究提供了官员更替之后企业积极“政治献金”,“主动配合”提供慈善捐赠的证据,而且发现这种“主动配合”主要体现在民企中和正式制度环境较好的地区(戴亦一等,2014)。本文则进一步提供了官员任期内企业“被动”慈善捐赠的证据,这种影响在正式制度环境较差的地区更加显著。(4)大量文献讨论了正式制度对政府与企业捐赠关系的作用(Detomasi,2008;贾明和张喆,2010;唐跃军等,2014),而非正式制度对于转型中的中国可能更为重要(North,1990;Greif,1994;Allen等,2005)。本文进一步从宗教传统角度探讨了在不同的非正式制度环境中官员行为对企业捐赠的影响差异,有利于更加全面地理解整体制度环境中政府与企业捐赠的关系。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政府官员任期与企业慈善捐赠

随着以GDP为核心的考核标准弊端日益凸显,中央关于官员考核的文件中逐渐明确了多维度的考核标准。尤其是2005年以后,“和谐社会”的提出使官员考核中精神文明、诚信友爱等方面的因素越来越受到重视。现有文献分别从“银行业主要金融机构不良贷款率”和“环境质量指数”两个方面考察了“和谐社会”中的“诚信友爱”和“人与自然和谐”特征(钱先航等,2011;Zheng等,2014)。而随着慈善捐赠被纳入“和谐社会”中的“诚信友爱”考核指标中,企业捐赠也会受到官员行为的影响。第一,周黎安(2007)指出,在其他考核指标难以量化的情况下,GDP才成为主要的考核指标。但随着和谐社会多维度量化考核的提出,官员在晋升压力下可能会主动追求较高的捐赠额度。第二,周雪光(2005)强调信息不对称一直是中央考核下级官员的难点,许多文献发现官员在晋升时会压制负面消息、催生正面消息(Jin等,2014;Piotroski等,2014)。而企业捐赠具有较强的公众效应,^①往往被媒体作为重要的正面消息广泛宣传,这会向上级传递有效的政绩信号,使上级对官员的综合能力给予更高的评价。反之,如果地区的慈善捐赠规模过小,地方政府可能会受到上级和社会公众的关注和批评(张敏等,2013)。

官员上任初期对工作环境和地区环境往往有一个循序渐进的熟悉过程,而官员的任期越接近5年考核期,其政绩可能直接决定是否晋升。除经济上的政绩外,官员对捐赠类“形象工程”的需求也会不断增强,从而积极干预企业捐赠。在任期超过5年一届的考核期之后,官员晋升的概率下降,其对捐赠类“形象工程”的需求会减弱,从而干预企业捐赠的动机

^①例如,加多宝集团在汶川和雅安地震中的捐赠行为均获得公众的广泛称赞, <http://news.qq.com/a/20130426/000589.htm>, http://finance.ifeng.com/special/yaan_qiye/20130426/7972768.shtml。

减弱。我们预期,企业捐赠会随着官员任期呈现先增后减的倒U形变化趋势。由于地方政府在股权和人事任命上的控制,官员追求慈善的动机更易传导到地方国企中。

假设1:地方官员任期与地方国企捐赠之间存在倒U形变化关系。

(二)政府官员任期、正式制度与地方国企捐赠

制度环境对企业慈善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Detomasi, 2008):第一,企业高管要考虑政治制度是否赋予他们合法的权利去从事慈善活动,社会准则和法律标准会影响高管如何看待慈善活动,进而影响企业从事慈善活动的方式;第二,制度环境决定了企业与政府之间关系的价值,从而对高管推动企业慈善行为产生正向或负向激励。当地区的正式制度较完善时,法律、市场中介以及投资者保护等能够有效发挥作用,市场契约能够有效执行,地方政府的寻租空间会较小(La Porta等, 1998),从而官员干预企业捐赠的难度较大,导致其晋升动机对企业捐赠的影响较小。

假设2:在正式制度环境较完善的地区,地方官员任期对地方国企捐赠的影响较小。

(三)政府官员任期、非正式制度与地方国企捐赠

多数宗教倡导慈善的价值观,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企业捐赠。当企业的宗教氛围较浓厚尤其是利益相关者的宗教价值观较强时,企业会遵从宗教价值观进行捐赠,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官员任期对企业捐赠的作用。一方面,当企业的宗教价值观较强时,其捐赠更多地基于社会的真实需要,而非行政需要,从而会减弱官员任期对企业捐赠的影响;另一方面,官员因任期考核会追求捐赠类的“形象工程”,但宗教氛围浓厚地区的企业平时就表现出“乐善好施”(Du等, 2014),从而捐赠在该地区有较好的表现,使官员无须投入太多精力应付任期考核。即使官员在任期不同阶段的晋升动机差异会对企业捐赠产生差异性影响,由于企业平时会进行较多捐赠,这种差异性不会突出地表现出来,也不会为官员的任期考核增加明显的政绩,从而官员在这方面会投入较少精力。

假设3:在宗教氛围较浓厚的地区,地方官员任期对地方国企捐赠的影响较小。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

本文以2003—2011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初始样本,并剔除了以下样本:(1)非国有和中央政府控制的上市公司,以及实际控制人性质在年报和CSMAR数据库中无法找到的公司;(2)金融行业的上市公司;(3)ST类和PT类上市公司;(4)最终控制人所在省份和上市公司所在省份不同的上市公司;(5)在CCER和CSMAR数据库中重要变量信息不全的上市公司。我们最终获得2003—2011年有捐赠额的3601个观测值。为了消除极端值的影响,本文对连续变量进行了上下1%的winsorize处理。

(二)模型

为了检验假设1,我们构建了如下模型:

$$Donation = \beta_0 + \beta_1 Tenure + \beta_2 Tenure^2 + \sum \gamma control + \varepsilon \quad (1)$$

其中,被解释变量为企业慈善捐赠规模(*Donation*),参考高勇强等(2011, 2012)、张建君(2013)的研究,以慈善捐赠额的自然对数来衡量。本文最主要的解释变量为官员任期(*Tenure*)。参考现有文献(张军和高远, 2007;王贤彬和徐现祥, 2008;曹春方等, 2014),本文用省委书记的任期来度量。如果官员在1—6月上任,则当年记为其任期第一年;如果在7—12月上任,则下一年记为任期第一年,并合并计算担任省长再升任省委书记的任期。我

们在模型中加入了官员任期的平方项($Tenure^2$),以考察可能存在的非线性影响。参考曹春方等(2014)的研究,官员任期变量取滞后一期值。参照已有研究(梁建等,2010;贾明和张喆,2010;高勇强等,2012;张敏等,2013;Du 等,2014),本文在模型中还加入了一些控制变量(见表 1)。

表 1 主要变量定义

变量符号	变量定义
<i>Donation</i>	捐赠规模,慈善捐赠支出的自然对数
<i>Tenure</i>	官员任期
<i>Market</i>	市场化指数,数据来自樊纲等(2011)编制的《中国市场化指数——各地区市场化相对进程 2011 年报告》
<i>Legislation</i>	市场中介组织发育和法律制度环境,数据来自樊纲等(2011)编制的《中国市场化指数——各地区市场化相对进程 2011 年报告》
<i>Religion</i>	宗教传统,如果公司所在地 250 公里或 300 公里以内的重点寺庙和道观数量大于中位数,则为 1,否则为 0
<i>Central</i>	异地官员,如果从中央调入,则为 1,否则为 0
<i>JZ</i>	董事长与总经理是否兼任,如果兼任,则为 1,否则为 0
<i>PC</i>	高管的政治关系,如果 CEO 为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则为 1,否则为 0
<i>Shrcr</i>	股权集中度,公司前 10 大股东持股比例之和
<i>Size</i>	企业规模,年末总资产的自然对数
<i>Roa</i>	总资产报酬率,净利润/总资产(期初)
<i>Lev</i>	资产负债率,总负债/总资产(期初)
<i>Direct</i>	是否与消费者直接接触,如果公司产品与消费者直接接触,则为 1,否则为 0 根据证监会公布的行业代码,属于下列行业的公司为产品直接与消费者接触的公司:C4370、C4830、C4930、C7505、C7510、C7515、C7620、C7825、C13、C55、F09、H11、C0、I、J、K、L
<i>Pollution</i>	是否重污染,如果公司属于重污染行业,则为 1,否则为 0 根据《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指南》,以证监会公布的行业代码为准,下列行业为重污染行业:C43、C4301、C4310、C4320、C4330、C4360、C4370、C47、C7310、B01、B0101、C31、C3105、C0501、C81、C8501、C8110、C11、C1110、C4915、B07、B0501、B0701
<i>Listyear</i>	上市年限,所在年份-上市年份
<i>HHI_sale</i>	市场竞争程度,行业赫芬达尔指数(<i>HHI</i>)
<i>East</i>	如果上市公司注册地为东部城市,则为 1,否则为 0
<i>GDP_PC</i>	上市公司注册地所在省份的人均 GDP 增长率
<i>Ind</i>	行业固定效应,根据 CSMAR 数据库中提供的行业代码 A,共有 6 个类别:金融、公用事业、房地产、综合、工业和商业,剔除金融业,有 5 个行业,设置 4 个行业虚拟变量
<i>Year</i>	年份固定效应,本文涉及 9 年的上市公司数据,设置 8 个年份虚拟变量

本文以分组的方式在模型(1)的基础上检验假设 2 和假设 3。正式制度的度量参考张敏等(2013)、唐跃军等(2014)等研究,采用樊纲等(2011)编制的各地区市场化总体指数作为代理变量(*Market*),以其中的重要分项指标市场中介组织发育和法律制度环境指数(*Legislation*)作为替代变量,分别以中位数将样本分为两组。非正式制度用公司的宗教氛围来度量,参考 Du(2013)及 Du 等(2014)的研究,以上市公司 250 公里或 300 公里范围内的寺庙和道观数量来度量,以中位数将样本分为两组。

(三)描述性统计

表 2 报告了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从中可以看出,企业捐赠规模(*Donation*,企业捐赠支出的对数)的均值为 12.19,中位数为 12.30。省委书记任期 *Tenure* 的均值为 3.36

年。*Maxtenure* 表示省委书记最长的任期,均值为 4.52 年,极大值为 15 年(新疆,1995—2009 年由王乐泉连任)。

表 2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25%分位数	中位数	75%分位数
<i>Donation</i>	3 601	12.19	2.07	10.91	12.30	13.65
<i>Tenure</i>	3 601	3.36	2.48	2	3	4
<i>Maxtenure</i>	3 601	4.52	2.58	3	4	6
<i>Size</i>	3 601	21.69	0.99	20.97	21.59	22.31
<i>Roa</i>	3 601	0.03	0.06	0.01	0.03	0.06
<i>Lev</i>	3 601	0.52	0.19	0.39	0.53	0.65
<i>Direct</i>	3 601	0.27	0.44	0	0	1
<i>Pollution</i>	3 601	0.23	0.42	0	0	0
<i>Listyear</i>	3 601	9.22	4.34	6	9	12
<i>Zjn250km</i>	3 601	11.82	10.97	3	8	19
<i>Zjn300km</i>	3 601	15.25	12.74	5	12	25
<i>Shrcr</i>	3 601	55.77	14.91	44.78	56.67	66.36
<i>JZ</i>	3 601	0.11	0.31	0	0	0
<i>PC</i>	3 601	0.08	0.28	0	0	0
<i>HHI_sale</i>	3 601	0.11	0.11	0.05	0.07	0.13
<i>East</i>	3 601	0.53	0.5	0	1	1
<i>GDP_PC</i>	3 601	0.12	0.03	0.1	0.12	0.13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官员任期对地方国企捐赠的影响

官员任期对地方国企捐赠影响的回归结果见表 3。从中可以看出,*Tenure* 的系数显著为正,*Tenure*²的系数显著为负,表明官员任期与地方国企捐赠之间呈现倒 U 形变化趋势,假设 1 得到了验证。从总体上看,随着官员任期的增加,官员促进民生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的努力程度增大,导致企业捐赠增加;但在官员任期逼近或超过一届之后,其晋升机会下降,努力程度随之减小,从而地方国企慈善捐赠的政治动机减弱。由估计系数计算可知,官员任期影响企业捐赠的峰值出现在任期第 5 年,说明任期考核不仅影响官员追求经济增长等经济政绩,也影响官员追求捐赠类“形象工程”。这也说明 5 年一届的任期虽然在短期内有利于民生和社会和谐,但这种和谐可能并不是企业自主选择的结果,而是政府官员过度干预的扭曲行为。

表 3 官员任期对地方国企捐赠的影响

	预期符号	系数估计值
<i>_cons</i>		−6.364*** (0.000)
<i>Tenure</i>	+	0.075** (0.035)
<i>Tenure</i> ²	−	−0.007** (0.021)
<i>Size</i>	+	0.828*** (0.000)
<i>Roa</i>	+	6.111*** (0.000)

续表 3 官员任期对地方国企捐赠的影响

	预期符号	系数估计值
<i>Lev</i>	+	0.298 (0.144)
<i>Direct</i>	+	0.277*** (0.000)
<i>Pollution</i>	+	0.306*** (0.000)
<i>Listyear</i>	—	—0.024*** (0.008)
<i>Shrcr</i>	—	—0.003 (0.205)
<i>JZ</i>	+	0.085 (0.376)
<i>PC</i>	+	0.391*** (0.000)
<i>HHI_sale</i>	+	1.035*** (0.000)
<i>East</i>	—	0.014 (0.836)
<i>GDP_PC</i>	+	—0.621 (0.615)
<i>Ind</i> 和 <i>Year</i>		控制
<i>N</i>	3 601	
<i>Adj.R</i> ²	0.281	
<i>F</i>	60.678	

注:括号内为 *P* 值(经 *White* 异方差稳健性修正),*、** 和*** 分别表示在 10%、5%和 1%的水平上显著,下表同。

(二)正式制度、官员任期与地方国企捐赠

官员任期在不同的正式制度环境下对地方国企捐赠的影响差异检验结果见表 4。从中可以看出,官员任期对地方国企捐赠的影响仅体现在市场化水平较低(中介组织发育和法制环境较差)的地区,在市场化水平较高(中介组织发育和法制环境较好)的地区则不显著,从而假设 2 得到了验证。这表明正式制度的完善能够有效约束官员行为,从而减弱官员任期对企业捐赠的影响。

表 4 正式制度、官员任期与地方国企捐赠

	市场化水平高	市场化水平低	中介组织发育 和法制环境好	中介组织发育 和法制环境差
<i>Tenure</i>	0.043 (0.408)	0.143** (0.023)	—0.056 (0.591)	0.109** (0.016)
<i>Tenure</i> ²	—0.004 (0.314)	—0.015** (0.017)	0.005 (0.712)	—0.011*** (0.003)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i>N</i>	1 832	1 769	1 802	1 799
<i>Adj.R</i> ²	0.264	0.276	0.279	0.278
<i>F</i>	32.116	29.717	34.657	27.175

注:受篇幅限制,表中未报告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下表同。

(三)非正式制度、官员任期与地方国企捐赠

我们进一步讨论了官员任期在不同的非正式制度环境下对地方国企捐赠的影响差异,

重点考察了宗教传统这一非正式制度，检验结果见表 5。从中可以看出，在宗教氛围较强的环境中，地方国企的捐赠行为并不受到政府官员的影响；而在宗教氛围较弱的环境中，官员任期对地方国企捐赠则具有显著影响。假设 3 得到了验证。这说明宗教环境这一非正式制度也会抑制官员行为对企业捐赠的影响。

表 5 非正式制度、官员任期与地方国企捐赠

	250 公里范围内		300 公里范围内	
	宗教氛围强	宗教氛围弱	宗教氛围强	宗教氛围弱
<i>Tenure</i>	0.046 (0.494)	0.108** (0.024)	0.082 (0.220)	0.090* (0.057)
<i>Tenure</i> ²	-0.005 (0.487)	-0.010*** (0.008)	-0.008 (0.258)	-0.009** (0.011)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i>N</i>	1 879	1 722	1 848	1 753
<i>Adj.R</i> ²	0.274	0.297	0.287	0.287
<i>F</i>	31.887	31.728	34.330	30.183

（四）稳健性检验

为了保证上述结果的可靠性，本文做了以下稳健性检验：^①（1）重要变量的替换：将企业捐赠变量进行了标准化处理，以（慈善捐赠总额/总资产）作为被解释变量进行了回归分析。（2）不同的估计方法：采用公司层面的聚类处理重新进行了回归分析。（3）剔除捐赠异常事件年份的样本：2008 年和 2010 年我国发生两次严重的自然灾害（汶川地震和玉树地震），为了排除突发事件对企业捐赠可能产生的影响，本文剔除 2008 年和 2010 年两年的样本做了稳健性检验。（4）样本选择性偏差问题。为了避免样本选择性偏差（即在财务报告中没有披露捐赠的样本）带来的结果偏误，本文运用 *Heckman* 两阶段回归模型重新进行了估计。上述检验结果均表明本文的结论是稳健的。

五、进一步讨论

（一）对民企和央企捐赠的影响

上文的理论分析强调官员任期对企业捐赠的影响是基于官员的动机，而捐赠也可能是企业以换取资源为目的主动配合官员行为。为此，我们以民营企业为样本进行了对比测试。另外，我们还以与地方政府无产权联系的中央国企为样本进行了对比测试，进一步验证了官员任期影响企业捐赠的路径。回归结果见表 6 中列（1），可以发现，省级地方官员任期对央企和民企捐赠的影响并不显著。央企由中央政府直接管辖，地方政府对其行政干预非常有限；而民企不管在股权还是人事任命上都不受到地方政府的直接影响，地方官员任期对民企慈善捐赠的影响必定不如地方国企。

（二）和谐社会的影响

2004 年 9 月 19 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正式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想。2005 年以来，中国共产党提出将“和谐社会”作为执政的战略

①受篇幅限制，文中未报告稳健性检验结果，如有需要可向作者索取。

• 129 •

任务。因此,我们预期在“和谐社会”提出之后,政府官员更加重视社会慈善捐赠。我们将样本划分为 2003—2004 年及 2005—2011 年两个时间段,回归结果见表 6 中列(2)。可以发现,官员任期对地方国企捐赠的倒 U 形影响主要体现在“和谐社会”提出之后。

(三)GDP 绩效的影响

本文认为,官员追求慈善的动机源于考核体系中存在捐赠等指标,但正如晋升锦标赛的相关文献所阐述的,GDP 绩效指标在官员考核中一直存在,并占据重要地位。那么,官员在拥有不同 GDP 政绩时追求慈善的动机是否存在差异,回归结果见表 6 中列(3)。可以发现,官员任期对地方国企捐赠的影响主要存在于 GDP 绩效较好组,在 GDP 绩效较差组则不显著。可见,官员是在拥有 GDP 政绩的基础上追求慈善,即当 GDP 政绩较好、晋升概率较大时,官员比较重视地区和谐社会的考核指标,从而追求慈善,干预地方国企捐赠。

(四)官员来源的影响

地方官员可能来自地方也可能来自中央,其来源不同,则在经历和经验上存在差异,从而在政治激励上也可能存在差异(王贤彬和徐现祥,2008)。因此,本文以中央调入和地方调入来区分官员来源,回归结果见表 6 中列(4)。可以发现,官员任期对地方国企捐赠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地方调入的官员上,对于中央调入的官员则并不显著,表明官员在个人任期内追求“形象工程”的动机因来源不同而存在差异。中央调入官员任期的影响不显著,可能是因为:第一,中央调入的官员过渡性质较强,可能是为了历练或者是解决某些专门的问题,如山西煤矿生产安全问题等(杨海生等,2010);第二,中央调入的官员与中央的关系密切,更了解中央意图,更能让中央了解自身努力情况,从而不会过多关注任期内的“形象工程”。

(五)企业政治层级的影响

我们以省委书记为例考察了官员任期对地方国企捐赠的影响,虽然在我国“下管一级”的政治体制下,省委书记的动机在理论上会影响市级官员的行为,从而对辖区所有国企存在影响,但现实中国企的最终控制人具有不同的政治层级,省委书记影响更多的是其直接管辖的省级国企,对市县级国企的影响则需要通过市级官员甚至县级官员来实现,传导链条较长。因此,我们进一步区分了省级和市县级地方国企,回归结果见表 6 中列(5)。可以发现,省委书记任期对地方国企捐赠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省级国企层面,在市县级国企中则不显著。这说明官员追求“形象工程”的动机主要体现在其所在层级政府直接管辖的企业中,而在下级政府管辖的企业中,由于传导链条较长,没有得到明显的体现。

表 6 进一步讨论

	(1)央企和民企		(2)按和谐社会分组		(3)按 GDP 政绩分组		(4)按官员来源分组		(5)按企业政治层级分组	
	央企	民企	2003— 2004 年	2005— 2011 年	GDP 增长率高	GDP 增长率低	中央调入	地方调入	省级国企	市县级国企
<i>Tenure</i>	0.021 (0.712)	0.037 (0.390)	−0.018 (0.888)	0.070 ⁺ (0.064)	0.120 ^{***} (0.030)	0.045 (0.368)	0.039 (0.844)	0.086 ^{**} (0.031)	0.092 ⁺ (0.056)	0.014 (0.791)
<i>Tenure</i> ²	0.004 (0.439)	−0.004 (0.310)	0.005 (0.714)	−0.007 ^{**} (0.029)	−0.011 ^{***} (0.010)	−0.004 (0.369)	−0.016 (0.592)	−0.008 ^{**} (0.013)	−0.009 ^{**} (0.025)	0.001 (0.880)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i>N</i>	1 411	2 954	656	2 945	1 626	1 975	745	2 856	1 725	1 876
<i>Adj.R</i> ²	0.404	0.287	0.108	0.29	0.262	0.289	0.277	0.285	0.292	0.277
<i>F</i>	37.808	46.638	5.154	51.139	24.935	35.542	12.594	52.373	32.368	32.51

六、结 论

本文研究了官员任期对地方国企捐赠的影响,结果表明:(1)随着任期的增加,官员推动民生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的努力程度增大,导致企业捐赠增加;但在官员任期逼近或超过一届之后,其晋升概率下降,努力程度随之减小,地方国企慈善捐赠的政治动机减弱。(2)官员任期对地方国企捐赠的影响仅体现在市场化水平较低的地区,在市场化水平较高的地区则不显著。(3)在宗教氛围较弱的环境中,官员任期对地方国企捐赠的影响更加显著。(4)官员任期对企业捐赠的影响在“和谐社会”提出之后更加明显,在“和谐社会”提出之前则不显著。(5)官员任期对企业捐赠的影响集中体现在地方调入的官员身上,对于中央调入的官员则不显著。(6)官员任期对地方国企捐赠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省级国企层面,在市县级国企中则不显著。(7)官员任期并不影响民企和央企的捐赠。

在中央屡次强调不再简单“以 GDP 论英雄”的背景下,^①部分省份已经逐步完善了政绩考核指标,企业捐赠作为可度量的考核指标存在于政绩考核体系中。本文从政府官员的视角证实了我国政府对企业捐赠的干预。企业的捐赠如果不是其自愿的市场化行为,必然不利于企业的长期可持续发展,更不利于由微观企业组成的宏观市场的发展。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因此,如何克服官员行为的影响,引导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慈善捐赠的市场化至关重要。“不从制度层面解决问题,不会有慈善”(麦克·金斯利,2009)。本文研究表明,完善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能够有效约束官员追求慈善的短期行为。

本文的研究结论具有以下两点政策含义:第一,在完善官员晋升考核指标体系的过程中,加入民生类指标固然会在某些方面纠正官员行为,但也需注意新指标导致的“新型晋升锦标赛”的出现;第二,要保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如何抑制官员行为的不利影响是关键,而进一步发展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则是有效途径。

参考文献:

- [1]曹春方.政治权力转移与公司投资:中国的逻辑[J].管理世界,2013,(1):143—157.
- [2]曹春方,马连福,沈小秀.财政压力、晋升压力、官员任期与地方国企过度投资[J].经济学(季刊),2014,(4):1415—1436.
- [3]陈冬华,胡晓莉,梁上坤,等.宗教传统与公司治理[J].经济研究,2013,(9):71—83.
- [4]戴亦一,潘越,冯舒.中国企业的慈善捐赠是一种“政治献金”吗?——来自市委书记更替的证据[J].经济研究,2014,(2):74—86.
- [5]樊纲,王小鲁,朱恒鹏.中国市场化指数——各地区市场化相对进程 2011 年报告[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1.
- [6]高初建.政府应逐渐淡化劝募者角色[N].中华公司时报,2007-09-06.
- [7]高勇强,何晓斌,李路路.民营企业社会身份、经济条件与企业慈善捐赠[J].经济研究,2011,(12):111—123.
- [8]高勇强,陈亚静,张云均.“红领巾”还是“绿领巾”:民营企业慈善捐赠动机研究[J].管理世界,2012,(8):106—114.

^①参见中新网:“逾 70 县市取消 GDP 考核——中国正告别‘唯 GDP 论’时代”,<http://www.chinanews.com/gn/2014/08-13/6486146.shtml>。

- [9]郭剑花.中国企业的捐赠:自愿抑或摊派?——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财经研究,2012,(8):49—59.
- [10]贾明,张喆.高管的政治关联影响公司慈善行为吗?[J].管理世界,2010,(4):99—113.
- [11]梁建,陈爽英,盖庆恩.民营企业的政治参与、治理结构与慈善捐赠[J].管理世界,2010,(7):109—118.
- [12]麦克·金斯利.从贪婪到慈悲——启动金字塔底层的商机[M].中国台湾:天下杂志股份有限公司,2009.
- [13]钱先航,曹廷求,李维安.晋升压力、官员任期与城市商业银行的贷款行为[J].经济研究,2011,(12):72—85.
- [14]唐雪松,周晓苏,马如静.政府干预、GDP增长与地方国企过度投资[J].金融研究,2010,(8):33—48.
- [15]唐跃军,左晶晶,李汇东.制度环境变迁对公司慈善行为的影响机制研究[J].经济研究,2014,(2):61—73.
- [16]陶然,苏福兵,陆曦.经济增长能够带来晋升吗?——对晋升锦标赛理论的逻辑挑战与省级实证重估[J].管理世界,2010,(12):12—26.
- [17]王贤彬,徐现祥.地方官员来源、去向、任期与经济增长——来自中国省长省委书记的证据[J].管理世界,2008,(3):16—26.
- [18]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M].上海:三联书店,1958.
- [19]杨海生,罗党论,陈少凌.资源禀赋、官员交流与经济增长[J].管理世界,2010,(5):17—26.
- [20]杨团,葛顺道.中国慈善发展报告[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
- [21]张建君.竞争—承诺—服从:中国企业慈善捐款的动机[J].管理世界,2013,(9):118—129.
- [22]张军,高远.官员任期、异地交流与经济增长——来自省级经验的证据[J].经济研究,2007,(11):91—103.
- [23]张敏,马黎珩,张雯.企业慈善捐赠的政企纽带效应——基于我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管理世界,2013,(7):163—171.
- [24]郑志刚,李东旭,许荣,等.国企高管的政治晋升与形象工程——基于N省A公司的案例研究[J].管理世界,2012,(10):146—156.
- [25]周黎安.中国地方官员的晋升锦标赛模式研究[J].经济研究,2007,(7):34—50.
- [26]周雪光.逆向软预算约束:一个政府行为的组织分析[J].中国社会科学,2005,(2):132—143.
- [27]Allen F, Qian J, Qian M. Law, finance, and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J].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2005, 77(1): 57—116.
- [28]Detomasi D A. The political roots of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J].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2008, 82(4): 807—819.
- [29]Du X. Does religion matter to owner-manager agency costs? Evidence from China[J].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2013, 118(2): 319—347.
- [30]Du X, Jian W, Du Y, et al. Religion, the nature of ultimate owner, and corporate philanthropic giving: Evidence from China[J].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2014, 123(2): 235—256.
- [31]Greif A. Cultural beliefs and the organization of society: A historical and theoretical reflection on collectivist and individualist societies[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94, 102(5): 912—950.
- [32]Jin L, Xu N, Zhang W. The effect of politician career concerns on media slant and market return: Evidence from China[R]. Working Paper, 2014.
- [33]La Porta R, Lopez-de-Silanes F, Shleifer A, et al. Law and finance[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98, 106(6): 1113—1155.
- [34]North D C. Institutions,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 [35]Piotroski J D, Wong T J, Zhang T. Political incentives to suppress negative financial information: Evidence from China[R]. Working Paper, 2014.
- [36]Shleifer A. State versus private ownership[J].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1998, 12(4): 133—150.
- [37]Williamson O. The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Taking stock, looking ahead[J].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

ture,2000,38(3):595—613.

[38]Zheng S,Kahn M E,Sun W,et al.Incentives for China's urban mayors to mitigate pollution externalities: The role of the central government and public environmentalism[J].Regional Science and Urban Economics,2014,47:61—71.

Official Tenure and Local SOE Donations: Do Officials Pursue “Charity”?

Cao Chunfang,Fu Chao

(School of Accounting,Southwestern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Chengdu 611130,China)

Abstract: Using a sample of local state-owned listed companies in A-share market from 2003 to 2011,this paper examines the impact of official tenure on local SOE donations and analyzes the differences of this influence in formal and informal institutions.It comes to the results as follows: firstly,in order to meet the government performance examination, officials will pursue social charity as a means of “image project”,namely local SOE donations have an inverted U-shape tendency with the increase in official tenure; secondly,more perfect formal institutions (measured by marketization,the development of intermediary organizations and legal environment) and more growing informal institutions (measured by religious atmosphere) result in weaker effect of official tenure on local SOE donations; thirdly,the effect of official tenure on local SOE donations differs significantly before the proposal of harmonious society and varies with GDP performance,official origins and political levels of firms.This paper discusses local SOE donations from a perspective of official tenure,and extends & enriches relevant study on officials' championship promotion and the grabbing hand from governments.

Key words: official tenure; corporate donation; formal institution; informal institution

(责任编辑 康 健)

(上接第 41 页)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is stronger than poverty reduction from a perspective of single income indicator; secondly,the urban-rural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has a certain convergence tendency,and the contribution of rural areas to poverty slightly declines from 2000 to 2011; thirdly,at the early stage the ultra-poverty proportion exceeds 60%,but it drops to less than 30% at the late stage.

Key words: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dynamic change; ultra-poverty

(责任编辑 康 健)